

中国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历程与主要理论

邵培仁 廖卫民

(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 浙江杭州 310028)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肯定会有很多与媒介生态学相关的奇珍异宝,但是,更快地切入主题,我们还是先直接从传播学引进中国之后产生的中国传播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寻找和总结有中国学者特点的、真正属于中国学者自己的媒介生态学理论和思想。基于这一认识和想法,我们梳理和总结出以下六种媒介生态理论。

1 媒介环境论。

媒介环境或传播环境概念的提出和比较系统的研究,最早可以在中国大陆第一部传播学专著《传播学原理与应用》¹中找到,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用了8页专门讨论了传播环境问题。接着作者在《教育传播学》和《传播学导论》两部著作中又作了深入、全面的分析研究。

在生态学看来,环境是指生物栖息地以及直接或间接影响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因素;在社会学眼里,环境是指人类赖以生存的各种自然和社会因素。但在传播学视野中,传播环境,是指存在于传播活动周围的所特有的情况和条件的总和。在这种情况下,传播与环境表现为互动互助、相辅相成、共存共荣的互制关系。就是说,环境既是媒介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也是人类进行传播活动的基础和条件。环境作为人类进行传播活动的场所和容器,传播活动既在它里面表演,也在它里面存放和发展,环境对传播起着维护和保证的作用。媒介环境论认识到传播环境具有无限性、开放性、差异性、相关性、影响性等特点,它对传播活动作用的性状也是可变的而非定向的,是自发的而非自觉的,并且是潜在的、渐进的和渗透的。

媒介环境论强调,它所要研究的不只是传播系统内部的媒介环境现象,而是从一定角度研究和审视整个世界,即还研究包括传播系统外部的地理环境、物理环境、社会环境现象,诸如规范因素、价值因素、经验因素、以及政治、经济、道德法制、文化等社会意识的综合情况,甚至心理环境的状况,都可从特定的窗口进入传播学者观照、分析的视野,成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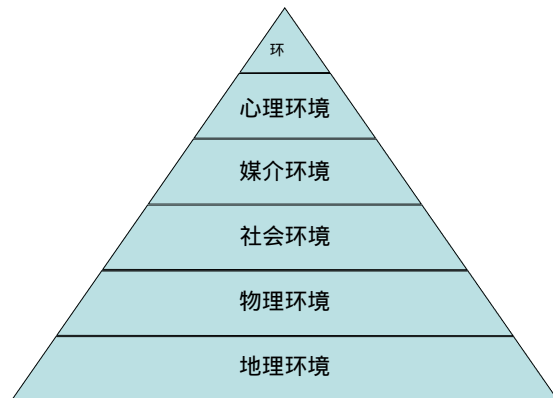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邵培仁,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学、媒介管理学;廖卫民,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学、数字娱乐产业。

此为2007年度江浙沪社科规划办联合招标、浙江省立项的“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系列研究课题。课题名称:长江三角洲区域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现状调查;课题负责人:邵培仁。

¹ 戴元光、邵培仁、龚炜著:《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25-332页;邵培仁主编:《教育传播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6-227页;邵培仁著:《传播学》(修订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16-331页。

研究体系中的一部分。

媒介环境论依据研究对象同自然地理的距离将环境分为地理环境、物理环境、社会环境、媒介环境和心理环境（图 2-1 环境金字塔），越是向上同自然地理的距离越远。地理环境是指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包括地理位置、气候、地貌、植被和自然资源等人们生活和传播活动有关的那一部分自然条件；而物理环境是指非自然的、存在于传播活动中的能减弱或加强传播效果的特定的人为的物理情境；社会环境是指存在于传播活



动中的由人类主体聚集、汇合后所形成的社会状况和条件；媒介环境是指大众传播机构在运作管理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整体气氛，是由大众传播活动全体参与者的行为方式聚合后形成的一种习惯模式；心理环境是指由人类自身皮肤之内的种种心理活动所构成的情感状态。这就比较全面、系统地将与传播活动有关的所有环境现象和问题都包

括在研究范围之内了。

后来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一书在此基础上，专门以 环境与传播 和 社会环境与传播 为题用两章篇幅来讨论环境与传播的关系问题²。倪延年主编的《知识传播学》一书也设立了 知识传播环境论 一章，系统论述了教育传播和知识传播中的环境问题³。[蔡凯如](#)在《穿越视听时空：广播电视传播论》⁴一书则从媒介信息与媒介经营的角度，用了两章篇幅专门讨论 广播电视的传播环境 和 中国广播电视市场面对的海外传媒环境 。支庭荣在《大众传播生态学》⁵从传播生态学角度对媒介的 拟态环境 和 大众传播的国际环境 进行了有颇有意义的分析研究。这些研究均从不同角度和层面丰富和充实了媒介环境理论。

2 媒介整体论。

媒介整体论是邵培仁于 1991 在《关于传播模式的思考与构想》一文和《政治传播学》一书中提出来的，后来在《传播学导论》一书中又进行了十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⁶。 它是指

² 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³ 倪延年主编：《知识传播学》，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⁴ [蔡凯如](#)著：《穿越视听时空：广播电视传播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

⁵ 支庭荣著：《大众传播生态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

⁶ 邵培仁：《关于传播模式的思考与构想》，《新闻学》1991年第 4期；邵培仁主编：《政治传播学》，南京，

对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等人类重要传播系统的内在机制与外部联系进行的一种直观的整体的综合的呈现与描述。因此,它不仅要充分考虑本系统与外部世界的复杂联系,而且要重视传播过程中各种因素共同构成的整体关系以及人类传播的全部现象。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传播世界是一个整体。为了避免在考察局部再组合成整体的过程中丢掉重要的整体信息,应该从整体的观点来认识媒介世界。媒介的整体意义是在局部组合中形成的,局部分析对于整体模式重建,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枝节。媒介整体论的基本任务始终是再现整体,始终把各种要素有意识地归并到整体之中,努力找出传播的本质和规律,同时再进一步认识它,适应它,支配它;而被割断联系的游离于整体的孤立的传播因素是无法认识、无法把握、无法支配的。因此,媒介整体论要求传播学者在研究中要自觉地和正确地将整体与局部、要素与因子、内在结构与外在关系等有机结合起来,不要忽视问题的任何一个方面。

媒介整体论的认识对象既是整体的又是互动的。整体互动模式抛弃了传播的单向性和被动性,突出强调了传播的双向性和能动性,昭示了传播的多向性和复杂性。在研究中,整体互动模式将整体看作是互动因素的聚合与归并,将互动当作是整体形态的链条与部件,将两者的有机统一视为对人类传播活动的全面而综合的呈现,也是为传播研究寻找一个辩证分析的模式和途径。整体互动模式包括了三个系统,即人际传播系统、大众传播系统和网络传播系统。这三个系统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它们将协同并存、互动互助、共进共演。

媒介整体论不仅具有媒介生态学精神特质,而且可以给媒介生态研究提供思考路线和理论构架。在某种意义上,媒介整体论所具有的四个特点也可以看作是媒介生态学的研究特点:(1)它强调整体性和全面性。(2)它强调辩证性和互动性。它的各要素是双向交流、多向沟通的,也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共同发挥效应的。(3)它强调动态性和发展性。它往复循环、生生不息,强调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4)它强调实用性和非秩序化。它不像其他理论那样具有理想化色彩,它密切关注现实,紧密联系实际,是从现实传播活动中抽取出来的,又为实践活动服务。

3 媒介系统论。

所谓系统,是指相互关联的元素的集或处于一定相互联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成份的总体⁷。媒介系统论首先是方法论,它是以传播整体为起点,用联系、转化的观点,综合研究传播系统的信息流动过程和信息的形式与结构,以便获得有系统的整体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页;邵培仁著:《传播学导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3-96页。

⁷ [奥]L. 贝塔兰菲著:《一般系统论》,秋同、袁嘉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7页。

性的性能和知识。作为研究方法,系统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有区别的要素组成的集合体和统一体,但是整体并不等于各要素的简单迭加;系统是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各要素只有按照某种合理结构有机的组合起来形成系统才能获得整体效益和整体功能;作为人工系统的信息传播系统总是带有一定目的的,而凡是带有目的性的系统也必然是可以控制和协调的系统;凡是系统都有层次,而层次都是有序的,无序便无系统;任何系统都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系统除了与本身内部事物密切联系外,还必须会同外部环境发生联系,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所以必须适应环境的变化。⁸

媒介系统论更是媒介生态系统论。崔保国教授率先对媒介生态系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他认为,媒介生态系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媒介系统、社会系统和人群,以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媒介与个人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受众生态环境;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媒介制度与政策环境;媒介与媒介之间的相互竞争构成了媒介的行业生态环境;媒介与经济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则构成了媒介的广告资源环境。

崔保国认为:媒介生态系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媒介生态系统具有多种层次,多种结构,可以作各种不同的划分。按照人类活动范围可分为村落、城市、区域、全球、宇宙等媒介生态系统。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单位一般以城市或区域来划分。应该是基于某个区域或城市范围内的媒介个体、媒介种群以及媒介与个人、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对于媒介生态系统的构成,崔保国参照生物学家的办法,按照媒介在社会信息系统的传播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富有创造性地将媒介生态系统划分为六界:即媒介符号系统、媒介资源系统、信息处理媒介系统、信息储存媒介系统、信息传播媒介系统和信息接收媒介系统等。并且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有时还会使这六界媒介系统之间相互转变和相互融合。⁹

我们认为,不论是作为方法论层面的媒介系统理论,还是作为生态论层面的媒介系统理论,它们都可以为媒介生态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4 媒介信息论。

基于媒介生态学视野的而一般方法论意义上的信息研究,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中始于1988年出版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该书主要讨论了信息污染和信息饱和。作者认为,

⁸ 邵培仁著:《传播学导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29页。

⁹ 崔保国:《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2期。

信息污染,是指信息内容对社会的危害。对于媒介中色情、暴力、凶杀等内容造成的信息污染,作者指出,不同的国家、政体、制度实际上采取的态度并不相同,理论界的看法也不一致。有的认为,信息污染是一种社会公害,控制信息污染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也有的认为,信息污染是社会的稳定剂、溢洪道,目的是让人们津津乐道于暴力、色情、通俗低级文化,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从而缓和政治、经济危机。因此,人类并不需要生存在一个无菌的物质世界中。高度净化的信息环境,会使人变得简单、片面和麻木,失去思维活性。所以,关键问题是控制信息污染的程度。作为爆炸状态的信息饱和,是指在某一阶段、时间内,信息量超过了人维持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信息饱和并不是指知识增加了多少,而是因为电子媒介的迅速传递,使各门各类知识又重新聚在一起,以高度相关的状况集中起来涌向接收者,从而使人无所适从,失去心理平衡。¹⁰

《传播学导论》一书除了深度分析了信息浸染和信息爆炸的表现和危害,还分别探讨了知识(信息)匮乏和信息侵略的特征、原因以及人为干预的措施。¹¹作者认为,信息匮乏是信息爆炸的伴生现象,也是信息爆炸的负面效果。大众一方面因信息爆炸而不知所措,另一方面又因大众媒介提供的巨量信息中严重缺乏他所需要的有价值的、能了解事情真相的、对自己有用的信息而苦恼不已。与西方学者的媒介入侵论不同,中国学者提出的信息侵略论认为,当一个国家试图利用其传播优势,有预谋地引诱或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最终是以异域信息生态嫁接和取代本地信息生态,就是信息侵略。而真正的信息交流,通常是善意平等的、自觉自愿的,是以相互信任、相互学习的态度借鉴和吸收对方的精华信息。在一些论文和著作中,作者还讨论了信息泛滥、信息超载、数字鸿沟、信息公平等既是媒介生态、媒介状况、又是社会后果和社会问题和论题。¹²所有这些信息论题,事实上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信息生态或媒介生态问题,也都是理论与现实中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5 媒介地理论。

媒介地理研究与媒介生态研究实际上是一对姐妹研究。当你讨论媒介地理问题时,你会涉及生态;当你谈论媒介生态问题时,你又会涉及地理。地理是无数生命循环的起点

¹⁰ 戴元光、邵培仁、龚炜著:《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61-167页。

¹¹ 邵培仁著:《传播学导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82-195页。

¹² 邵培仁著:《传播学》(修订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50-151页、第161-162页;邵培仁、张健康:《关于中国跨越数字鸿沟的瓶颈与对策》,《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和终点,也是生命循环的基础之一。女娲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也被尊奉为人类之母。 女娲用泥土造人的传说正好反映了人与地理的生命依存关系。 无数事实证明,当人类和媒介的发展尊重并顺应地理的特点和习性时,它们就发展顺利,呈现出繁荣昌盛的状态。当人类应对地理环境的创造力衰退或协调不当时,媒介文化就开始衰落,进而又会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这里的媒介与地理关系也可看作是媒介与生态的关系。从媒介发生学的角度考察,从人类发明媒介的那一刻起,媒介就与地理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学术联系和媒介地理现象。 因此,媒介地理学关注和重视特定地域产生的特定媒介形态,及其相同媒介形态中呈现出的不同地理样本,认同和理解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人的不同传播特点,以及不同区域受众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的地理看法,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媒介地理学就是从人类、媒介与环境的关系中去研究人,研究人如何在特定的环境中发明媒介、使用媒介和活化媒介,如何自觉不自觉地通过媒介呈现地理、审视地理或突破地理,进而达到人地协调、天人合一。

毫无疑问,人类是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人类的传播活动要受到一定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因此,传播是人性的外化,也是环境的折射。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形态包括传播和文化等活动,都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于是相同的媒介形态却能反映出不同的地理样本和生态环境。随着网络传播的进一步发展,人类面临的将是地域媒介的消亡和全球媒介的崛起,传统的媒介地理学将被颠覆或改写。当下,全球媒介地理的形势与媒介生态的形势一样,都是十分严峻的。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技术、人力优势着力构筑传播高地,而好多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信息盆地之中;大众媒介正受到利益驱动加速将自己打造成城市媒介和市民媒介,而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农民则处于信息的边缘地带;媒介源地的本土性和地方性论述及其对本地方言的过度坚持,有可能演变为先进文化、民族文化的反对派和落后文化的保卫者。同时,知识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信息差距也正日益扩大。不断加深的文化差异、媒介歧视和信息鸿沟正把人类带入了一个充满冲突、不平等和分裂的时期,给正在建设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带来潜在威胁。¹³

6 媒介生态论。

国内学术界在论述中国媒介生态学的发生史时,一般是从媒介生态理论的核心概念媒介生态的出现来认定。崔保国教授认为,在我国现有的文献中,最早提出媒介生态概

¹³ 邵培仁:《媒介地理学:行走和耕耘在媒介与地理之间》,《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3期;邵培仁:《作为最新研究视野的媒介地理学》,《媒介方法》2006年第1期;邵培仁、潘祥辉:《论媒介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与学科建构》,《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邵培仁:《论媒介地理学的正当性、科学性和学术坚守》,《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关于媒介地理论的论述均引自这几篇论文。

念并对 媒介生态 进行系统、深入论述的是邵培仁的《论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和《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两篇论文，从而 开创了国内媒介生态研究的先河。¹⁴叶芳、庾月娥在对 1979至 2005年《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研究后，虽然发现 1996年已经出现 文化媒介生态 一词，但文章不是关于 媒介生态 的研究，而邵培仁的 两篇论文被誉为媒介生态理论的开山之作应该是不虞之论。¹⁵《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偏重于媒介实践论，通过联系媒介实际，运用传播学和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对传播过程中个人、群体、媒介和其它社会系统之间的矛盾、冲突、协同的诸种生态关系进行了探讨和分析，梳理和总结出了五种具有较强解释功能的生态规律——传播生态位规律、传播食物链规律、传播生物钟规律、传播最小量规律和传播适度性规律，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媒介生存策略。¹⁶《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一文建构了一幅比较清晰的媒介生态学的版图，以一种分析性架构综论 当代媒介生态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的和谐关系和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而作出的新的认识和理性思考，提出要树立媒介生态整体观、媒介生态互动观、媒介生态平衡观、媒介生态循环观及媒介生态资源观五大观念，来迎接市场经济的考验，与西方媒介巨人展开全方位的竞争，化解媒介生态危机。¹⁷这两篇论文对国内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起了引导和启发的作用。随后，国内不少学者加入到媒介生态学的研究中来。

其实，在此之前，邵培仁在《论人类传播史上的五次革命》一文中，就曾针对 传统媒介死亡论 提出 媒介生态规律可能有别于自然生态规律 的观点，认为在 新的传播革命爆发后，人类在旧的传播革命中所使用的传播手段不会被随之抛弃，而总是以一种新的面貌又出现在新的传播活动之中。它们的生存与发展似乎并不遵循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的法则，好像更符合互动互助、共进共演的原理。例如，文字传播并未淘汰语言传播，电子传播并不排斥印刷传播，而网络也未对抗电子传播，它们的发展似乎是一种相互竞争、相互借鉴、相互协调的关系。¹⁸媒介生态发展的事实似乎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媒介生态的法则有其特殊性，有别于自然生态法则——优胜劣汰、物竞天择 的媒介生态法则——互动互助、共进共演 也已得到学术界广泛的认同和引用。

¹⁴ 崔保国：《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2期。

¹⁵ 叶芳、庾月娥：《中国大陆 媒介生态理论 研究述评》，《新闻知识》2006年第7期。

¹⁶ 邵培仁：《论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新闻界》2001年第3期。

¹⁷ 邵培仁：《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新闻大学》2001年第4期。

¹⁸ 邵培仁：《论人类传播史上的五次革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6年第7期。

在中国大陆,《中国传媒报告》是最先开辟研究专栏的重要杂志,在 2003年第 2期和第 3期该杂志连续以“媒介生态研究”专栏发表一系列国内外专家学者在媒介生态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媒介生态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刘易斯·芒福德与科技生态学》、《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试论史前媒介生态中非语言媒介的演变》、《传媒歧视:论当代信息传播中的不平等》、《公共政策变迁和媒介生态循环》、《试论中国电视文化生态的转型》等。这一系列论文的发表、转载和网络传播,推动了我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发展和深入。

接下来,从媒介生态学主体论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以下成果。许永论述了媒介的内生态,她把媒体间竞争与制衡所形成的结构体系作为媒介的“内生态”,并从优化资源配置的角度指出,媒体要正常发展,需要从认识媒介内生态开始。¹⁹王炎龙运用“结构整体性、物种有限性、要素依存性、机制非线性”和“运动扩移性”等传媒生态规律探讨电视产业生存逻辑。²⁰张志林、王京山运用“生态位”原理分析了网络媒介的运用规律。²¹邢彦辉通过对传媒生态系统中各资源间的关系分析、单个传媒生态系统中的资源循环、多个传媒生态系统中物质与能量的流动与转换三方面的分析,指出传媒生态资源的循环对于传媒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与升级具有重要的作用。²²陈祁岩从媒介的宏观系统探讨了我国媒介产业化发生的生态学解释。²³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使用媒介生态的学术触角逐渐延伸。有的学者认为,要维持健康的媒介生态,必须通过对媒介的正确使用,来维护并保持和谐的媒介环境,使公众与媒介、媒介与社会保持一种互动互补的良性关系。²⁴有的学者认为,媒介作为社会中的一个子系统,与其他的社会子系统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媒介生态的局部机能失衡,会破坏媒介生态向均衡的复归,影响社会的稳定与进步;媒介应该找准边际,控制媒介机能的正效应和负效应,维持均衡,克服信息不对称。²⁵何镇飏从生态系统要素组成、媒介生态循环、公共政策、媒介生态评价等多个方面,提出应该通过媒介广告自律与公共政策实现媒介生态良性循环,实行媒介生态系统的多元化评价,自觉执行媒介广告自律,实现媒介生态改良和长远利益。

¹⁹许永:《优化媒体资源从认识媒介内生态开始》,《新闻知识》2002年第11期。

²⁰王炎龙:《传媒生态规律与电视生存逻辑》,《声屏世界》2003年第1期。

²¹张志林、王京山:《网络媒介生态位初探》,《出版发行研究》2005年第12期。

²²邢彦辉:《传媒生态系统中的资源循环》,《当代传播》2006年第3期。

²³陈祁岩:《中国媒介产业化发展演变的生态学探讨》,《理论月刊》2005年第9期。

²⁴王敏芝:《从媒介生态看政治生态》,《报刊之友》2003年第5期。

²⁵徐尚清:《非典报道与媒介生态平衡——对非典报道的边际与信息均衡的分析》,《新闻与写作》2003年第6期。

²⁶也有学者针对媒介盲目集团化指出,强者未必是适者,而适者一定是强者。媒介的多样性应是实现媒介与社会发展及二者良性互动的重要途径;中小型媒介应该顺应形势、遵循规律,根据自身特性确立发展思路和运营模式,而不应该盲目跟风。²⁷还有学者认识到,生命个体的生机来自于 生境 中的 生态位,媒介的生机则来自于 媒介生态位。媒介生态位中的媒介竞争主要表现为 媒介种群 内的媒介对该 媒介种群 的 媒介生态位 各位段的争夺,因此在 媒介生态位 上进行正确定位,能够使各媒介之间真正实现错位竞争。²⁸同样,即使像电视新闻栏目创新,也要讲究栏目生态定位,要使新闻栏目与新闻理念之间维持一种对位关系,即栏目的内容与形式、栏目的构成与编排要对位,从而使栏目运作的人才资源、信息资源、受众资源、财力资源的使用和调配的过程合理循环,确保品牌栏目的传播效应。²⁹也有人认为,西方媒介的环保新闻报道从内容、形式到风格,不仅值得从媒介生态学的角度去分析,而且也能给媒介生态研究以启迪。³⁰

针对媒介生态的恶化趋势,罗锋认为,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媒介生态要求人们确立媒介环境保护观念,构建正确的信息传播与消费模式,确保媒介生态的总体平衡和良性循环;以话语权寻租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的有偿新闻严重破坏了媒介生态,导致生态环境危机,使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呈现传播食物链中断、媒介生态结构失衡、信息资源浪费等恶性循环态势;因此,治理有偿新闻应采取权力监控、加大寻租成本等措施。³¹对于媒介歧视造成的媒介生态失衡和信息不公平,引起了樊葵的注意。她认为,在当代信息传播过程中,传播者总是偏爱某些阶层的受众而忽视甚至歧视另一些阶层的受众。它的实质是一种传媒歧视。从长远来看,传媒歧视将日益加剧现代社会的知识信息鸿沟,破坏媒介生态和平等公正原则,不仅可能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同时也会影响和扭曲大众媒介自身的发展。³²陈兵对于中国媒介生态中出现的新闻自由的滥用、公共论坛的缺失、媒体犯罪传播的加剧、受众科技享乐主义的蔓延和全球美国化的肆虐等五大危机,探索了传播生态重建的对策,认为应当从树立正确的生态观、鼓励媒介自律、实施媒介他律,实践木桶理论、倡导政府作为、营造共栖主义等六个方面重建生态平衡,从而推动我国传播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³³

²⁶ 何镇飏:《从媒介生态角度谈广告自律》,《当代传播》2004年第2期。

²⁷ 金长江:《中小型新闻媒体运营战略思考——兼谈集团化选择的或然性与媒介生态》,《中国三峡建设》2003年第9期。

²⁸ 樊昌志:《媒介生态位与媒体的生机》,《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6期。

²⁹ 谢立文:《媒介生态位与电视新闻栏目创新》,《电视研究》2004年第12期。

³⁰ 蔡启恩:《从传媒生态角度探讨西方的环保新闻报道》,《新闻大学》2005年第4期。

³¹ 罗锋:《试论媒介“寻租”行为对媒介生态的破坏》,《泰山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³² 樊葵:《当代信息传播中的传媒歧视》,《当代传播》2003年第5期。

³³ 陈兵:《拯救传播:论传播生态的失衡与重建》,《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第2期。

对传播生态学进行全面、系统和集中研究的博士论文有张健康的《媒介生态的失衡与调适》(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2006年);专著有支庭荣撰写的《大众传播生态学》。该书将大众传播生态学界定为基于生态学的大众传播学,主要研究大众传播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媒介的技术性特征是传播媒介物种区分的标志,传播媒介之间的竞争、捕食、寄生关系及其构成的种群整体,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文和经济景观;媒介作为经济组织的自利性与作为社会组织的公益性,这种内在的冲突是致命;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传播系统调控和自我调控的阈值不同,是避免过度竞争带来灾难性结果的重要保护性机制;如何抑制我国处在市场化与行政性夹缝中的传媒的无序性运作和泡沫化趋势是传媒生态不可忽视的问题。

从以上的研究,目前中国大陆关于媒介生态的研究主题,或是直接将生态学理论应用于媒介问题的研究;或是从不同角度研究媒介生态的个案或宏观研究;或是以媒介生态为研究视角或作为研究框架,探讨其它媒介问题。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媒介生态研究更多地侧重在媒介内源性生态的研究上,重点讨论的是媒介业务、媒介经营管理。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偏向微观层次的研究,与以人类为中心的、偏向宏观层次的西方媒介生态研究,有着显著的差异。这说明,一是我国的媒介生态研究从一开始就试图强化其学术性的原子核和中国化,以避免在宏观的文化研究中丧失自我和本真;二是与西方媒介生态学者大多来自文化研究领域不同,中国研究媒介生态的学者大多来自新闻传播学科;三是侧重媒介业务、媒介经营管理的研究也是与当前中国急速发展的媒介集团化的背景分不开的;四是最先进入媒介生态研究的学者其思维模式及其成果对后来者起到某种思维定势的作用。

中国大陆的这种研究现状,恰恰说明媒介生态研究在中国仅仅是一个处女地,还正处在探索和成长时期,人们对媒介生态学的理解和认识还相当肤浅和狭隘。这也是一种新的方法和思考方式出现时的典型情况之一。往往从应用的目的出发,从一些媒介现象出发,面对一种新的理论,有点手足无措,慌不择路。从目前来说,媒介生态学研究不论是现象描述、应用分析还是理论建构,其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够,需要越来越多人和资源继续投入。另一面,这种研究有待深入和落地,应该脱离单纯理念的证明和演绎,落实到真正的中国土地和传播学研究的土壤里。因此,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也开始出现,要求我们不能仅仅停留的理论的借用、对部分现象的解释和过于明确的功利性,而应该进行真正的本土化研究和理论建构,使媒介生态研究真正成为学问,成为扎根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学术大地上的和有自己旺盛生命力的一棵大树。